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4.3

4 issues a year in 13 languages

社會學作為志業

Zsuzsa Ferge,
Melvin Kohn

第18屆ISA世界大會

Margaret Abraham,
Vladimir Ilin,
Michael Burawoy

外包的自我

Arlie Hochschild
interviewed by Madalena
d'Oliveira-Martins,
Amrita Pande and
Ditte Maria Bjerg

法國社會學

Bruno Cousin and
Didier Demazière,
Christine Musselin,
Frédéric Lebaron,
Frédéric Neyrat,
Romain Pudal

- > 社會學和環境變遷
- > 秘魯的採礦的原住民
- > 國際化下的捷克社會學
- > 岌岌可危的捷克社會學
- > 阿拉伯團隊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4卷 / 第3期 / 2014/10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不斷進步的ISA

這個夏天 ISA 在橫濱舉辦了第 18 屆世界社會學大會 (7/13-19)，由日本在地委員會和 ISA 秘書處共同籌辦。總共有 6087 人註冊參與，創下歷史紀錄。總共有 1100 個場次。這也讓這期的全球對話刊出了俄羅斯社會學家 Vladimir Ilin 的想法：ISA 是不是太大了。而這也選出了新的執委會和會長 Margaret Abraham。這期的全球對話刊出了她對於社會學貢獻社會正義的熱情期待。

這期我們刊登了 5 篇關於法國社會學的文章，強調了其對法國公共領域和政策的貢獻。同時作者們也討論學術的官僚化、專門化，以其同儕審查的專業化，和出版英文文章的壓力。捷克則有著大不相同的狀況，因為處於半邊陲的捷克仍想要努力向核心邁進。

一開頭則是介紹了兩位有名的社會學家如何把社會學當作志業。Zsuzsa Ferge 從匈牙利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的脈絡檢視其生涯，並從窮人和邊緣人的立場回顧這一切。而 Melvin Kohn 則描述了其先驅跨國研究的，聚焦在個性和結構。另外也訪問了 Arlie Hochschild，其情緒勞動和感覺商品化的概念影響深遠。Amrita Pande 和 Ditte Bjerg 則分析代理孕母的展演，這是 Pande 在印度進行的研究。從這裡我們的確看到了公共社會學的新形式。

我是在瑞典寫這篇文章的。而此時正值北歐社會學會舉辦雙年會。年輕社會學家在 Lund 聚會，討論北歐的福利體系和移民對此的影響。北歐國家中，特別是瑞典，接受了許多戰亂國的移民，但其福利、教育、工作的被歧視仍然存在。人道主義的空隙中，總是有社會學家的影子！



Zsuzsa Ferge 是匈牙利著名的政策分析與批判家，回憶其當初如何對於經濟學無法解釋社會不平等的失望而轉向社會學的經過。



Melvin Kohn 是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描述如何透過社會結構和個性的研究串起了跨國合作的機會。



Margaret Abraham 是新任的 ISA 會長，描述社會學怎麼和社會正義結合，並聚焦在性別暴力上。



全球對話由
SAGE Publications 贊助。

全球對話以 13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A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Ritu Saraswat, Nidhi Bansal,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Hamidreza Rafatnejad, Abdolkarim Bastani, Tara Asgari Laleh, Faezeh Khajezadeh.

波蘭: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Kamil Lipiński, Przemysław Marcow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Adam Mü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Zofia Penza.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Telegdy Balazs,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Mihai Bogdan Marian, Alina St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Yonca Odabas, Günnur Ertong Attar, İlker Uurlu, Zeynep Tekin Babuç, Hüseyin Odabaş.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不斷進步的ISA

2

社會學志業：轉向投入社會學

by Zsuzsa Ferge, 匈牙利

4

社會學志業：跨國合作的一生

by Melvin L. Kohn, 美國

6

> ISA世界大會

講社會學為社會正義奮鬥

by Margaret Abraham, 美國

9

橫濱世界大會的回顧

by Vladimir Ilin, 俄國

12

Immanuel Wallerstein獲頒ISA卓越獎

by Michael Burawoy, 美國

15

> 外包的自我

情緒勞動和世界：訪談Arlie Hochschild

by Madalena d'Oliveira-Martins, 西班牙

16

印度製造：嬰兒農場速寫

by Amrita Pande, South Africa and Ditte Maria Bjerg, 丹麥

19

> 今日的法國社會學

21世紀的法國社會學

by Bruno Cousin and Didier Demazière, 法國

22

消失的學術生涯

by Christine Musselin, 法國

24

評價法國的社會學

by Frédéric Lebaron, 法國

26

變遷中的法國社會學專業

by Frédéric Neyrat, 法國

28

為什麼法國社會學沒有人類受試者規範

by Romain Pudal, 法國

30

> 面對環境議題

社會學在那？環境變遷和社會科學

by Stewart Lockie, 澳洲

32

銅、水、土地：秘魯 Piedra Alta的礦業

by Sandra Portocarrero, 秘魯

35

> 捷克社會學的挑戰

國際化和審查文化

by Martin Hájek, 捷克

37

捷克社會學的危機

by Filip Vostal, 捷克

39

阿拉伯團隊

by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亞

41



社會學作為志業：

轉向投入社會學家

by Zsuzsa Ferge,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匈牙利



Zsuzsa Ferge.

我為了生活而成為了社會統計專家，那時 1950 年代，我在唸經濟學。我被分派到負責分析家戶預算的工作。其工作包括了拜訪全國的家庭，然後計算每個家庭每月所得，食物開銷、買個小孩的用品。這個工作比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等，有趣多了。所以我離開經濟，轉向更貼近人民和社會的工作。

後來我開始分析家庭資料，並發現那些統計數據可以讓大眾不要被意識形態所綁架，也不要那麼政治化所有的事情，放下成見看待不平等。當時的統計局長很心胸開闊，核准了一項在 1956 年之後的大型調查計畫 (20000 戶)，探討階層化。這個字在政治上的象徵性很大，所謂的階層化是個具有正當性的稱呼，而社會階級則否。我們可以研究低收入戶但不要觸及使用貧窮等字眼。社會統計可以有正當性，可是社會學要到 60 年代才有。

社會階層的報告中有各種社經群體的特徵，並描述了低收入戶者。一個隱微的圖像是權力、知識、產權等不平等分配成為了這些群體化分的基礎。

社會不平等仍然是任何事情的核心。在配對了許多統計事實，許多問題就浮現了。從一開始我的主要問題是怎麼降低不平等，特別是從小孩一出生開

Zsuzsa Ferge 是匈牙利著名的統計社會學家。不論是在國家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Ferge 總是可以致力於不平等、貧窮、邊緣化等研究，出版了超過 15 本書，上百篇文章。作為匈牙利的著名知識分子，她也總是保持批判性，並貢獻社會政策。其成立的第一個社會政策系是於 1989 年在 Budapest 的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ELTE)。直到 2011 年解散為止，她帶領整個 National Program against Child Poverty 團隊做研究，這個團隊位於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此外，她也被許多獎項所肯定，更包括多個國家大學的榮譽學位。

始。後來在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的社會學研究所成立了(1963)，我們認為教育是一個可能的機制能讓不平等降低。這個研究和之前得很相關，也深深被當時的 Pierre Bourdieu 等的時代精神所影響。在歐洲，社會科學家希望教育可以幫助減少不平等。因此，從 60 年代晚期，我們的研究包括了各級學校，學生表現、生涯等，甚至還有教師的情況和意見。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現預期的影響。我們的研究顯示了雖然學校結構改變了，學業仍然繼續是不平等再生產的主要機制。

我們的問題還是一致的：有任何改變社會潮流的能動性嗎？而下一個研究的對象就是國家，或是更精確的說，國家行動對於不平等的結構性改變，特別是政策和重分配。所以從 1970 年早期，我們就開始探索匈牙利社會政策。1966 年，我有幸參加了 ISA 的世界大會，我遇到了後來貧窮、福利、政策委員會的成員 Herbert Gans, Peter Townsend, Henning Friis, S.M. Miller 等人，這些友誼後來開起了一個通往世界研究不平等、貧窮的大門。

後來我們繼續研究貧窮的結構變遷，然後開始檢視社會政策。結合社會學的結構視角和社會政策研究，我們構想出了社會性政策 (societal policy) 的概念，把社會政策研究結構到更大的結構變遷分析之中。1985 年，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的社會系支持下，我們創立了社會政策的學位。實際上這是在歷史社會學下，因為社會政策不具正當性。

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系在 1989 年成立，就在政權轉型的前夕。在新的資本主義體制下，社會結構同樣存在，但是重要性改變了。財產權和權力變成了最重要的，知識的重要性降低了，勞動力

市場 (工作機會、工作穩定、工作危險) 成為了結構性力量。我試著用 Bourdieu 的社會資本概念納入我的結構變遷理論之中，不過不太成功。但是社會和個人的連結似乎越來越重要，這或許不只有在現今的匈牙利才這樣。不平等、貧窮、特別是兒童貧窮，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大大增加了。

我退休之後仍持續研究兒童貧窮，然後和我的同事一起組織了 National Program to Combat Child Poverty 2007-2032。這個計畫是 2008 年中由匈牙利國會所採行，並執行了許多區域的對抗貧窮計畫，一直到 2011 年解散才終止。一個比較中間的計畫後來存活了下來，不過那計畫忽略了政策的辯論。從 2010 年開始，政府已經有反貧窮和支持中產階級的偏見立場，並且反兒童福利。進步的稅收被均一稅率、社會援助等取代，犯罪負責年齡從 14 歲降到了 12 歲。強迫就學從 18 歲降到 16 歲。

所以，雖然我批判國家社會主義 (或要說共產主義也好) 的不平等，我已經繼續用啟蒙的理念批判當前的社會。而當之前的政權瓦解之後，我們也才瞭解到之前的社會是相對較為平等的。而什麼是收入財富減少的代價、延伸、長期、短期的影響呢？而知識的不平等呢？若不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會很難去解釋自從政治經濟轉型後的變化為何。

最近幾十年代我已經試著結合研究、教學、田野到所謂的公民社會之中。我越來越相信若沒有強健的公民社會，國家和市場會不受拘束。這個信念是站得住腳的，因為只要看看匈牙利的公民社會就知道，孱弱的社會是無法約束國家和市場的。■

來信寄給：Zsuzsa Ferge <fergesp@t-online.hu>

> 跨國合作的一生

by Melvin L. Koh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國, ISA執行委員(1982-1990)



Melvin Kohn.

Melvin Kohng 是研究社會結構和個性的先驅，最有名的作品是 *Class and Conformity* (1969, 1977 再版)。這本書分析了階級如何和個性相關。他從調查資料著手這個棘手的題目，分線了工作自主(不被控制、任務複雜、工作多元)和自我導向的高度相關。相反地，那些包括例行性、高度勞力、單調工作的職業容易讓人的行為較為服從。他也發現了另外一種因果關係，也就是較為自我導向的個性比較可以找到類似這種性格的工作且勝任之。個性影響了許多生活的面向，不只教

育孩子，還包括了代間行為的傳遞。為了測試這個關係有多麼可靠，Kohn 大力提倡跨國比較，特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那些歷經巨大社會變遷的國家。他的其他書籍和文章也都是和這個主題相關。Kohn 已經相當有名，是美國藝術和科學學院的院士，也是美國社會學會的會長。後來也是 ISA 的熱情支持者，並成為執行委員 (1982-1990)，影響力很大。

在60多年之後，我身為一位經驗社會學家，我想我和其他人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我非常投入團隊研究，特別是在後來的40年裡面，我成為了跨國主義者。這很簡單，因為我很喜歡從理論導出經驗問題，特別是跨國的普遍性。在美國的許多發現也適用在歐洲嗎？若是如此，那在共產國家呢？若在蘇聯是，那在中國呢？其他國家文化呢？但我只會講英文和一點德文，那該怎麼辦？那就是找雙語的合作者。

這一切發生得很偶然。在Maryland的一位博士後研究延伸了個性和社會結構的研究到Washington, D. C.。我的同事Carmi Schooler認為應該要把這個研究延伸到美國的各行各業裡面。這是我第一次的合作，相當興奮。兩個人的興趣互補得很好。

但是那不是跨國比較。我第一次嘗試是和義大利TorinoLeonard Pearlín，比較我在Washington DC的研究。這不是真正的合作研究。雖然在一個很重要的點：父母的社會階級和父母對於自我導向的評價上我們有合作，可是不是跨國的。

事情後來有了突飛猛進的點。Włodzimierz Wesolowski是波蘭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他邀請我去幾場演講。我很高興的應約了，非常喜歡這種方式。Wesolowski後來希望可以在波蘭測試我的理論。波蘭的部份屬於他們自己，他們有資料、資金、人力，其徒弟Kazimierz (Maciek) Słomczyński跑模型，然後我是「技術諮詢員」。

這樣的合作便得一發不可收拾。Maciek和我後來密切合作發展跨文化比較的方式，特別是概念的意義和測量，把國內的模型可以延伸到同時研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國家，使用嚴格的方法。特別是波蘭團隊的幫忙，他們致力於這項合作研究，讓人非常欣慰。

兩本書和幾篇文章因此產生了，我指出了有力的證據，發現雖然社會結構和個性在美國和波蘭是很不同的類別，

但是卻是相關。兩個國家都顯示了高階級和高地位的人有較高知識彈性，更自我導向，而且很在意幸福。這些人的工作更為複雜，比較少受到控制，不從事很例行化的任務。

同時，很幸運地，Ken'ichi Tominaga和Atsushi Naoi把日本帶了進來。而事實上是比較美國、波蘭、日本。我們發現跨國的相似行非常大，唯一的例外是美國和波蘭的低技術工人的痛苦程度。日本則是在中間。

但是，當Maciek和我們發現波蘭人民挑戰威權主義時，我們問了一個新的問題：巨大的社會變遷（例如波蘭民主轉型和基督教）怎麼改變了我們的既有發現呢？Krystyna Janicka, Bogdan Mach, Wojciech Zaborowski等三位波蘭學者加入了，我們不僅研究社會結構的情境和個性的關係，也納入了女性和失業人口。

可是，在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又如何呢？研究東歐一直都很難，甚至機會很少，所以我都沒有嘗試。而這個時候我有了個機會去俄國，於是問了俄國的首席社會學家Vladimir Yadov是否願意合作。他可惜地說這個問題太敏感了（在Gorbachev政權下），不過他引藉了烏克蘭的兩位學者，一位是理論家Valeriy Khmelko，一位是社會心理學家Vladimir Paniotto。我們在研究設計時，蘇聯瓦解了，於是這兩位學者在烏克蘭成立了蘇聯史上第一個調查研究中心。從那時候開始，持續好幾個月，我在Warsaw和Kiev之間來來回回，分別和波蘭與烏克蘭的團隊合作。

從波蘭和烏克蘭的比較中，我學到了幾件事情，特別是發現這兩個國家越來越像美國和日本。勞工都很痛苦，也就是資本主義所謂的不變的勞動條件，但是也的確轉變了雇主和工人的關係。研究的尾聲，發現波蘭工人和美國工人其實是一樣的，烏克蘭則緊迫在後。而當波蘭團隊正要結束研究時，烏克蘭才剛要開始。在烏克蘭，事情進展的較緩慢，不過數量較多。烏克蘭有自己的資

金和調查產業，也有了後續研究，不過我只有我自己自私地分析了資料。

烏克蘭的後續研究是跨國長期比較的真正延伸。因為我們可以重新訪問受訪者。我發現了烏克蘭非常不穩定的個性，特別是在動盪的3年。這和馬利（特別是非洲其他國家）類似，那裡 Carmi Schooler 有很類似的發現。工作和個性的關係仍然是相對穩定，雖然係數減低了。我們的因果模型顯示了在特別的社會不穩定情形下，個性對於社會位置的影響較少，但是社會結構仍然有很強的影響力。

可是還沒有結束，我對中國一直很有興趣。我老婆便鼓勵我。後來我們一起到中國，她有阿茲海默症，所以每次對於我講的東西都感到很新鮮有趣，一直要我一定要去研究中國，即使她沒辦法看到我的研究成果了。我一直在找適合的研究合作對象，因為我一定會非常倚重這位合作者。所幸我遇到了 Lulu Li 和其徒弟 Weidong Wang。我也找了一位研究生 Yin Yue，成為了真正的研究者。Weidong 是收集資料，不可思議地在五個不同的城市同時收集資料。每個城市有一位教授合作，也和大學的學生合作訪問。Yin 則是新手，不過很快的就上手了。

中國的研究和我做過得跨國比較的發現一致，不過原因不同。其他國家中，階級和工作環境的關係，其工作複雜度、

控制、例行等是關鍵因素。可是中國的工作環境解釋力很小。在中國，其中的自我受雇者是偏差值，對他們來說，工作環境和個性沒關。為什麼？我想，並用我在北京遊走的經驗，這些人是很邊緣的人，真正影響他們的是生活環境的貧窮。這聽起來不錯，可是誰會聽我這個不會中文的人的猜想呢？很幸運地，我的兩位合作者提供了資料證明了這點。很久之前，Weidong 加入了一個關於受訪者戶口的問題，指出了受訪者住在城市或是鄉村。有一天，Yin 突然匆匆跑進我的研究室，給了我看了一篇文章，是由中國學者 Xiaogang Wu 和著名的美國學者 Donald Treiman 所寫的，指出鄉村來的移工因為不能脫離戶口，所以這些人不能有工作，也能買房子，小孩不能受教育。

這就是我設想的答案，印證了我兩位合作者的想法，加入了戶口問題，並且找到了這個一篇發表在中國學者不太可能看到的期刊的文章。我的兩位合作者和其他國家並沒有不同，認真、有想法、嚴肅、有能力、而且很好合作。■

來信寄給：Melvin Kohn <mel@jhu.edu>

> 讓社會學為 社會正義奮鬥

by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國 · ISA會長(2014-2018)



Margaret Abraham是新任的ISA會長，於橫濱大會上的演說。Kayo Sawaguchi攝影。

今年夏天7月，6087位社會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來自95個國家，在日本橫濱齊聚一堂，共同參與第18屆的社會學世界大會。這次大會相當成功，這要很感謝日本在地籌備委員會的貢獻，以及主席 Koichi

Hasegawa。此外也要感謝由 Raquel Sosa 帶領 ISA 計畫委員會，還有 ISA 副會長 Tina Uys，Robert van Krieken，Jennifer Platt，以及研究委員會、工作小組、主題小組。特別要感謝的則是執行秘書 Izabela Barlinska。最後是會議管

>>



新任會長Margaret Abraham拿著兩把武士刀，象徵傳遞權力，不過她拒絕拿刀砍前任會長Burawoy。Vladimir Ilin攝影。

理小組 Confex。

更重要的還有 Michael Burawoy 會長。他把這次大會主題定為「面對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會學的挑戰」，聚焦在公民社會所面臨的不平等，和日益嚴重的商品化和私有化。我們也對於 Michael 所創設的全球對話及其努力感到由衷的感激。全球對話透過電子媒體的方式把知識跨越國界，對全球的社會學社群貢獻良多。

我們現在有個契機去強化社會學和這個全球性組織的韌性，因為我們有了新的執行委員會的支持，還有副會長 Markus Schulz (研究), Sari Hanafi (國家學會), Vineeta Sinha (出版) and Benjamín Tejerina (財政和成員) 的大力幫助，相信一定可以成功。

我們的組織需要繼續對於世界的變遷和動盪

做出回應。不同於以往的是，現在我們面對更複雜的全球化，迫使我們必須推動社會學內部的對話。這個社群是不平等的。此外也要回應社會、經濟、政治的挑戰，一起合作，把整個 21 世紀的世界擴大。如我所知，ISA 的核心任務不是去解釋這個世界，而是去找出方法，讓未來更加美好。

作為新任的會長，我想指出幾個核心目標。儘管我們已經有長遠的進步，我們必須繼續發展 ISA 的全球性。ISA 的第一個組織目標是去代表各地的社會學家，不論思想學派和意識形態。全球北方和西方國家仍然是會員的多數，是研究進程的設定者。這讓知識交流有所受限。我希望可以增加 ISA 的會員數量，讓我們的組織真正的全球化，代表所有人和所有社會學思想。有了研究委員會和國家學會的幫忙，我們將會

考慮現實的方式去建立制度能力，支持那些沒有辦法加入全球組織的人。此外，也要增加年輕社會學家的機會，確保我們的活力。這必須要我們可以增加財政能力，所以我們可以確保更包容的參與和健全的財務狀況。這需要會員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ISA 的宣言強調「制度和個人的聯繫，將是世界的社會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串連起來。」跨領域的對話是很重要的，對於人文學科更是如此，因為各學科有著細緻的區分。我希望我可以擁抱、延伸、重新定義跨領域性。就像我們社會學要不斷地質問世界，所我們也要積極的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互動。ISA 的會議和工作坊可以從中獲益良多，包括了和其他領域的意見領袖互動。我希望可以把合作和交流推展到全世界。

當然，ISA 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社會學知識的全球拓展」，這意味著將社會世界納進系統的、批判的分析之中，並使其更美好。若把這個目標侷限在學術界，那是過度窄化 ISA 的視野了。我們必須有批判性的分析，但也要有行動和介入，包括和非政府組織合作，促進社會正義和進步變遷。ISA 應該要致力發展好的社會分析架構，嚴謹的方法，但也應該致力現實世界問題的解決，包括了屠殺、專制、恐怖主義、排外主義、種族歧視、基本教義、性別不平等、貪腐、環境惡化、社會排除等。作為 ISA 會長，我應該要強調社會學不只要分析，也要為推動社會前進努力。我要讓 ISA 可以更為這個目標邁進。

作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我從全球的女性主義研究社群和運動者身上學到很多，我特別關心性別暴力和歧視，這是世界性的問題。雖然對於女性是個威脅，但是這問題也牽涉到家庭、社區、整個社會。系統性施加於女性的暴力是普世的現象，我計畫去開啟 ISA 的一個全球的計畫，串連世界的學者，大家一起研討如何解決女性受到壓迫歧視的普世問題。

我們不能只從會議和期刊上瞭解我們身處的這個複雜衝突的社會。我邀請大家和我一起並肩努力，把社會議題廣為傳布出去，將專業的社會學知識化為常民的語言，讓老嫗能解。我們的電子媒體可以派上極大用途。此外，我也要建立全球性的

社會學知識地圖，讓更多學者使用電子媒體，讓更多複雜的脈絡和議題可以被知道。

ISA 是一個要發揮影響力的的組織，我們的會員可以帶入豐富多元的視野和技巧。我已經構想出了未來的藍圖，現在需要你們每一個人的建設性批判和合作！■

來信寄給：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橫濱世界大會的回顧

by Vladimir Ilin, State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 俄國



前台：Koichi Hasegawa是日本在地籌備會的會長，受頒獎章表揚其團隊的貢獻。Kayo Sawaguchi攝影。

ISA 的第 18 屆世界大會於 7 月 13-19 日在日本橫濱舉行。要回顧這次大會不是個討好的事情。不論誰說了什麼，總是會有反對的意見出現。而這次有 6000 人參加，是個超大的會議，我覺得就像瞎子摸象，要討論其實很難。所以以下只是我非常個人的觀點。

> 聚焦社會不平等

大會的主題是社會不平等及其挑戰、以及全球社會學。這是個即時的題目，儘管大家樂觀的覺得會很平等，但是事實上這個世界越來越不平等。社會學對於社會秩序的斷裂越來越敏銳，也有左傾的趨勢：馬克思主義者 Michael Burawoy 是 2010-

>>



後台：日本專業會議組織者、自願者、執行秘書、Confex。

2014 的會長，然後 Erik Wright 也到了會場。而世界社會學的左轉也被來自拉美、亞洲、非洲的擴張社會學家人數所影響，因為這些地區的資本主義更加動盪，刺激了許多新的批判理論。在 Burawoy 的會長演說中，他要大家注意教宗 Francis 的 2013 選舉，這是第一個來自全球南方的教宗，而且關心全球不平等。要聽到社會學家引用教宗的 Apostolic Exhortation 是很少見的，這是關於社會不平等，反資本主義的教廷宣言，其認為金錢應該替人民

服務，而非統治人民。Burawoy 也提到經濟學家應該也要注意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Burawoy 開始注意到參加世界大會的成員其實反應了全球物質資源的不平等，還有社會學發展的不平等。雖然全球南方的成員增加了，但是 71% 的參與者來自於全球富裕國家，只有 10% 的從貧窮國家來。不過當 ISA 於 1949 年創立時，其只代表了美國和西歐。現在當然是多元多了。

然而許多人相信民主

化社會學的社群也有負面的地方。越來越多的參與者不具備系統的專業教育，而且沒有機會去參與研究、使用社會學文獻。Immanuel Wallerstein 告訴我們第一次大會在 1959 年只有 300 人。幾乎所有人都來自於西方國家，參加者都是明星學者。超過 6000 人與會的這次大會絕對不是什麼名人俱樂部。許多社會學家認為更小的會議規模會比較有效，對於時間和金錢來說都是如此。許多社會學家只窩在小圈圈。

可是我們要怎麼改進



這個狀況呢？這個在民主化和精英鄉愁的兩難問題是個新的問題。

> 公共社會學議程

這次 Michael Burawoy 卸任了，他透過社群媒體建立了一個全球的社會學社群，也就是所謂的數位世界。他也常常到各地拜訪學者，形成了公共社會學的概念。這個概念也不是全世界都買單就是了。Burawoy 論證社會學可以跳出學院小圈圈，目標可以更廣大的放到全世界。這個視野原本是社會學社群內的權力平衡，把社會學帶到西方之外。逐漸的這個概念變成了激進社會學的同義詞，讓社會學變成促進世界正義的工具。

至於聚焦在社會正義的這個目標，橫濱大會做到了。社會學家可以積極參與改變是借的概念其實不新。畢竟，古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就是要改

變社會和科學分析並重。美國社會學一開始也就是要推動社會改革。Pitirim Sorokin 積極加入 1917 年的俄國革命，差點失去性命。許多 ISA 會長也都投身政治；而社會學家 Jan Szczepa ski 和 Alberto Martinelli 成為立法委員。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則是巴西總統。

不同的觀點在橫濱大會中都被提出來。前會長 Piotr Sztompka (2002-6) 是 Krakow University 的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反對公共社會學的人，認為社會學作為學術領域應該更謹慎、客觀，不應該投入社會改造。社會學家應該在圖書館，不該在戰場上。他認為社會學加的责任應該是瞭解社會不平等而非解決不平等。許多社會學家支持改革，是沒問題，可是要教化民眾，那可不行。社會學的责任是解釋社會機制，包括那些產生和再生產不平等的機制。馬克思花了大半的時間在

圖書館，不是戰場。他的成名作是資本論，不是共產黨宣言。

他推動一種一致社會學的概念，可以應用到富裕和貧窮的國家。人們不能有很多種社會學。社會機制和變遷是要具有普世解釋效力的，即使現象不一樣。社會學研究的比準和評價理論的方式應該一致。顯然，並沒有誰對誰錯。社會學本身就是多元的。■

來信寄給：

Vladimir Ilin <ivi-2002@yandex.ru>

> Immanuel Wallerstein

榮獲ISA卓越獎

by Michael Burawoy, 前ISA會長(2010-2014), 獎項委員會主席



Immanuel Wallerstein獲頒ISA傑出獎。Kayo Sawaguchi攝影。

橫濱世界社會學大會由一個新的獎項拉開序幕：社會學研究與實踐卓越獎。這個獎項鼓勵許多的提名，從許多的傑出候選人之中，由來自執行委員會7人組成的獎項委員會選出Immanuel Wallerstein。

這個獎項委員會從各方面的資料中發現，沒有人比Immanuel Wallerstein要對社會科學更有貢獻了。他的50年來的著作等身，貢獻良多。的確，他是少數的典範代表人物。

在1960年代開始，他分析非洲的殖民主義和民族解放鬥爭，然後處理了更廣泛的議題，特別是現代世界體系的興起，其理論架構根植在歷史知識之上。1974年開始他寫了第一卷的現代世界體系，1980，1989，2011分別出版了續集。他的方法讓社會學融入了比較歷史分析，把古典對於長期社會變遷的興趣帶了回來。其世界體系的架構持續影響著社會科學，吸引眾人的興趣。

當他重寫世界史，其分析反應了西方社會科學的侷限性。其中之一是學科的虛假劃分。他對於社會科學的重建看法可以從Open the Social Sciences看到。這是1995年的Gulbenkian委員會報告。從那時候他就撰寫了許多社會科學歷史和未來的文章。

Wallerstein不僅僅是一位知識巨人。他也全球社會學的公僕，到世界各地旅行，擔任許多重要的組織工作。他是1994-98的ISA會長，開創了世界社會學的窗口，讓全球社會學的窗口，讓拉丁美洲、非洲、亞洲、中東的學者更有機會參加國際交流。他也啟發了許多新生代。所以委員會認為他獲得這個卓越獎，實至名歸。■

> 全球情緒勞動

訪談 Arlie Hochschild



Arlie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是享譽盛名的社會學家，其研究證明了深度理論和平易近人的論述是可以相互結合成為很好的社會作品。其 8 本書中，包括了 *Managed Heart* (1983),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2003), *The Outsourced Self* (2012), 和最近的 *So How's the Family? And Other Essays* (2013)，她檢視了情緒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巨觀和微觀的社會互動。其源創性的概念像是「情緒管理」，「情緒勞動」，「感覺規則」等，都極其重要。你跟她談話，就會發現她是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社會議題的關注者。以下是葡萄牙的文化與社會研究院學者 Madalena d' Oliveira-Martins 於 2014 年 2 月 27 日在 Berkeley 所作的訪問。

MO: 你是 60 年代 Berkeley 的研究生，可以談談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以及怎麼影響了你的社會學觀點？

AH: 在 1962 年 10 月我剛到 Berkeley。古巴飛彈危機正要來臨，而美蘇冷戰正火熱進行著。Kennedy 總統和 Nikita Khrushchev 正在核武議題上相互威脅，一觸即發。有一天我到校園的中央廣場，看見一群學生、助教、教授等圍成幾個小群體，大概 10 個人、20 個人一群，激烈地討論著某些事情，像是我們正在面臨一場核武戰爭嗎？和平運動可以怎麼進行？等等。每個人都熱情地討論著，而我感覺，「對，這就是我想要的」。後來我想到這或許就是 Habermas 所謂的公共領域的理性言說。

>>

不久之前，我走在同樣的一個廣場上，看到學生來來往往，每個人都在講手機。他們都在講話，不過不是跟身邊的人講話。我發現公共領域不見了。這些面對面的對話都到了網路上。但是共同的目標和立即的感覺不見了。不論如何，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更多 60 年代的樂觀主義，覺得世界可以改變。

MO: 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是情緒勞動，也就是一種召喚或是壓抑的心態，讓自己有一種對於工作的正當感受。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概念嗎？

AH: 在社會中，隨著服務業的發達，這個概念解釋了許多工作的日常生活實在，像是保母、托兒所、老人照顧、護士、老師、治療師、收帳員、警察、勞工等，越來越少的工作像是砍樹、鑿井、製造等等。取而代之的是面對面的、聲音對聲音的互動，提供服務。那些互動稱之為情緒技巧。

MO: 我在妳 Global Woman 的文章「Love and Gold」以及在 So How's the Family? 的「The Surrogates Womb」中，發現妳把情緒勞動的概念用在全世界各地了？

AH: 我一直在研究保母和老人照顧，這些人從其他南方國家隻身來北方國家，行成了保母鍊。我受到了 Rhacel Parrenas 研究的影響，也訪問了在加州 Redwood 市的菲律賓保母，她們也僱用保母去照顧她們在母國的小孩，形成了另外的保母鍊。

MO: 妳把這個結果稱之為「心的移植」(heart transplant)？

AH: 是，女性心的表達在此脈落一分為二。這個分化需要很強的情緒勞動。被移植的保母要管理她的孤獨和對於所照顧小孩的困惑情感，她們照顧其他人的小孩比自己的小孩時間還長，有些甚至沒看到自己的小還有好幾年了，因為她們的小孩在 Manila 或是 San Pedro Sula 或是 Michoacan 等南方城市。那些保母費是用來給她自己小孩上學用的，可是小孩卻可能不喜歡、討厭、生氣，甚至對自己的母親感到疏離。

MO: 妳也寫過關於印度代理孕母怎麼把自己

的子宮當作箱子的文章。

AH: 是，我所作過的訪談之中，最感人的是我在印度 Anand 訪問商業代理孕母的案例。其中有個很貧窮的女性，為了生計當代理孕母，一次 3000-5000 美元，國內和國外都有

。從這些案例和社會學家 Amrita Pande 的研究中，我稱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子宮出租服務業。為了生計，代理孕母必須學習管理自己對自己身體的情緒，那這子宮到底是誰的？也要管理對那個懷在度中的小孩子的情感，即使生出來後不會再看到，但是還是會記住。

保母和代理孕母必須面對這種情感異化的挑戰。19 世紀，馬克思給了我們異化的震撼圖像，那就是歐洲的工人。我則認為，21 世紀，這些被異化的人是來自全球南方的女性服務業工人。

MO: 妳也提出過「擬情地圖」(empathy map) 的概念。德國社會學家 Gertrud Koch 把她的書「擬情之道」獻給妳。什麼是擬情地圖？

AH: 那是一個被我們想像出來的社會空間，和其他社會空間區隔開來。我們對於空間內的人會給予理解和同情，但是邊界外的人則否。兩個群體內的人可以對各自群體內的人給予很大的理解和同情，可是兩個群體之間卻彼此敵對。若把這個地圖展開，我們必須要自己跨過界線，我對於這樣的行動感到相當有興趣。

MO: 在妳 1975 年的文章 The Sociology of Feelings and Emotions 中提出了一個新的領域：情感社會學？

AH: 是，情感是社會學的核心。若我們是政治社會學者，我們必須去問政治信念後的情感，以及這些情感從哪裡來。若我們是經濟社會學者，我們必須去問經濟信念後的情感，偏好背後的情感，甚至是股票市場上的笑與淚。每個社會學的次領域中都有情感，那是核心，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精緻地看待。

在 70 年代我在構思這個概念的時候，有幾股潮流湧現。一個是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女性的概念正在變化，感覺和情感管理也在改變。有些時候女性必須改變，有些

>>

時候也可以透過正當化照顧改變辦公室的文化。而服務業大量擴張，企業越來越大，新的情緒管理需要也要回應工作以外的關係，私領域的擴張，家庭生活的脆弱，舊的基礎的減少，對於情感關係的需要等等。所有這些讓我了解到我們必須發展一個概念來讓我們可以更深刻了解社會生活的核心情感問題。

MO: 妳會擔心像是心裡學或是其他領域研究情緒的方法嗎？

AH: 噢，那是當然的，我甚至擔心我的導師：Erving Goffman。有一次我和他，以及其他幾位學者在一輛車上，他那時候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書，然後到加州來旅行。他對我說：「Arlie，這些在車子裡的情感，我很好奇妳要怎麼科學地進行研究？不可能吧。」他是很科學的人，但是對於人類心理看成是黑盒子，認為不可能談論這種黑盒子內部的東西。可是他卻也很深刻地給了我們很多有用的對於黑盒子內部的概念與理論。

MO: 同一篇文章裡面，妳也說古典社會學忽略了「感受的自我」，認為研究情感要考慮個體的感知，這是說情感包含了評價思想的結果嗎？情感來自評價性思想或是衝動？

AH: 我會說答案是兩者都有。一方面，我認為情感是一種感知，像是視覺、聽覺、觸覺，嬰兒就有了。但是生物學的故事到此為止。社會學則是從這裡開始，去研究我們對於不同感覺如何理解、如何標籤、如何賦予意義，如何回應。心理學家則不會說：「對，我們有眼睛，故事結束。」他們會研究人類怎麼學習觀看這個世界。

我有個機會訪問到一個人，他這麼描述在極地的寒冬中行走的經驗：「身體被白雪包圍，然後突然間看到一雙黑色的眼睛，那是雪鳥，然後你就會繼續尋找那一雙黑色的眼睛，準備好要再看到，從此白雪對你來說變得不一樣了。」而我們的感覺就是這樣。我們準備後要去享受快樂或是憤怒。我們有期待狀態，對感覺會有期待。

然後和我們期待感覺不同的是，我們也會有對於我們應該怎麼感覺有所想法。「我應該對得獎感到高興，或是我改對犯罪感到恐懼。」諸如此類的就是微觀的感覺，我們透過此建造感覺地圖和管理感覺。我們常常想

像我們自己是自由的社會科學家，可是我們若是不好好地研究感覺與情緒，我們會有多自由？

MO: 在市場社會裡面，我們創造了焦慮，也想解決焦慮，於是有了服務業。我們也持續尋找家庭價值或社會價值。那情緒，以及情緒的管理，是一種更好衡量界線的概念嗎？認為心理力和經濟力是互斥的嗎？

AH: 我們常常用市場語言來描述我們的生活。「I buy that idea」，「I like her brand」，「He's invested in you」。這些比喻隱藏著情感規則。我在 So How's the Family 中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在你的地理周遭幫你找朋友的服務。這是付費服務，就是付錢，然後幫你找到朋友，然後得到資產報酬 (ROI)。若你登入這個服務，你會知道其他人也正在找朋友。若我們把找朋友也當作是投資的話，那我想知道那樣的情感規則影響了友情嗎？在 The Outsourced Self 中，我試著去問市場和個人生活的界線在那？這特別是在個人服務業專業化、擴張、延伸到各個社會階級的時候，特別重要。什麼時候我們會有情感警告，也就是說當我們感覺對自己的生活太疏離的時候？

MO: 可以談談下一個寫作計畫嗎？

AH: 在 The Outsourced Self 我研究我們怎麼在市場和個人的場域畫界。而現在我轉向一個不同的面向：政治和個人。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美國已經歷經了自由和保守派的對立。兩邊都有不同的道德地圖，也依循著不同的情感規則。自由派對於無人機轟炸和 NSA 監控感到恐懼，而保守派對於政府過度管制和徵稅感到不安。所以我想跨出我的自由派舒適圈，去看看保守派的人們怎麼感覺，去發現更多的情感規則，怎麼影響他們和我們的信念。我也想要找到一條橋，跨越兩者，然後一起到公共領域中想辦法讓社會更好。所以我持續傾聽這個社會。■

來信寄給 Arlie Hochschild <ahochsch@berkeley.edu> 或 Madalena d' Oliveira-Martins <madalenaom@gmail.com>

> 印度製造： 嬰兒工廠

by Amrita Pand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nd Ditte Maria Bjerg, Global Stories Productions, 丹麥



Amrita Pande慶祝印度代理孕母作為有權利的勞工，製造胚胎和嬰兒。Morten Kjærgaard攝影。

「很好，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重要的戲劇表演，況且還是社會學博士和演員共同入境的。」

Simon Andersen, “Smagsdommerne,” 丹麥國家電視台。

對於我在劇場和表演研究的同事來說，創意演出社會現象或許沒什麼，可是對於社會學家卻很新奇。我們許多人是把創意帶入教室裡面，帶入教科書的社會學想像。

所以 Global Stories Productions 的藝術導演家 Ditte

Maria Bjerg 知道我是印度商業代理孕母的專家時，便問我是否可以和她合作一場互動的劇場表演，就是以代理孕母為主題。她的前一部作品是以美國社會學家 Arlie Hochschild 的情緒勞動為題，也是由於 Arlie，我才會和 Ditte 搭上線。他的計畫很簡單，就是把代理孕

>>



回到田野，代理孕母幫Amrita Pande 做Godh Bharai (baby shower)。Miriam Nielsen攝影。

母用藝術戲劇的方式呈現出來，也需要我博士論文田野經驗。我之前在印度的表演者經驗派上用場，搖身一變，從田野經驗提供者成為了教育者和表演者。

所以這個跨學科的旅程就此展開了。兩位藝術家和研究家開使用互動劇場的方式去表現代理孕母的議題。

我用社會學家 Amrta 所謂的用創意重新解讀自己的作品這種方式，以及創意藝術家 Ditte 所用的藝術家結合研究者的雙重視角，發展出下列的故事？我在「印度製造」這部戲中，強調兩個時間點：代理孕母所規劃給 Amrita 的 Godh Bharai (印度 baby shower 儀式)，以及代理孕母的編織活動。

一方面，這兩個時間點可以讓我們和代理孕母被醫學監控的「受規訓的母職工人」角色之外的身份互動 (Pande 2010)，另外，這個經驗也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的觀眾分享，特別是多數不曾和印度代理孕母的觀眾。我們研究把兩個時間點當作群體劇場。這裡有兩個群體：代理孕母和觀眾。這個互動劇場的目的是要去連結兩個群體，然後可以質問自己、他人、以及關係。

> Godh Bharai (baby shower)

Ditte：讀了 Amrita 的田野之後，我馬上了解到若要把這個故事轉換成劇場演出，

那我必須和 Amrita 去印度一趟。而我的團隊、舞台設計、攝影師等才可以製作場景，好讓觀眾一起互動。也一方面好好觀察社會學家 Amrita 和她的受訪者。要怎麼做其實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 Amrita 打電話給我，說：「Ditte…我們去印度的時候，我會是有身孕的。」

Amrita：Ditte 對我田野的介紹是關於我在印度生育醫院和代理孕母中心的經驗，我的田野分析都在我的書 *Wombs in Labor* 中可以找到。決定要再次回到田野是很緊張的。你從來沒辦法知道你的受訪者是否會歡迎你，或是抱怨你錯誤詮釋她們的人生。我回到田野的時

>>

機也很巧，因為我那時有6個月的身孕。我不太確定我的懷孕會怎麼被她們看待。我擔心對她們不尊重的這些事情，在我和這些之前我的受訪者聯絡上之後，都不見了。她們很開心的慶祝我這個天真(未婚)的研究者。而 Ditte 也把這個點納入互動劇場之中。

當我到達代理孕母中心時，我看到許多舊識。有很多人做代理孕母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了。她們很熱情地期待著 Godh Bharai。通常在懷孕第7個月的時候，她們就會被安排這個儀式。孕母可以被允許違反中心的規定一次，可以不用睡午覺一次等等。Jigna 是唯一一個上層卡司特的孕母，自願當儀式的祭司。然後 Puja 成為藝術家。這是6年來我第一次在田野中看到孕母離開床上，載歌載舞，大聲歡笑，不受約束。孕母要負責藝術團隊喜歡與否。若是藝術家的介入可以達成，那我完全同意！隨著歌聲，其中一位孕母 Vaishali 小聲的說：「唯一的不同是你們可以保有小孩。」

> 編織

Amrita: 所以在充滿焦慮的代理孕母工作中，其實會發現道德一直是辯論的重點。代理孕母中心更是代表

了這個觀點。「但是，一直討論道德有什麼用？這些貧窮的亞洲女性被迫販賣子宮賺錢，然後呢？我們難道不需要往前看，把這些女性看成工人，具有勞動權益？你說呢？」這是給歐洲觀眾所說的一段話，要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看看他們怎麼從道德的觀點轉移到勞動者的觀點。

Ditte: 其中一個給女性在代理孕母中心的「訓練」活動就是編織。每個星期有兩次，會有老師教導這些代理孕母如何編織一些像是花和葉子的圖案。這個非常性別化的活動看起來很適合孕母，因為這不會傷害嬰兒，不會讓孕母去挑戰規範，醫療人員，或是訪看。但是，我們想出了另外的一個點子，就是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和她們一起編織，而是去編織另外的圖案來代表孕母的工作內容呢？孕母會得到酬勞，而觀眾會得到真實的代理孕母工作象徵，並且理解這些孕母其實就是勞工，是可以生產嬰兒之外的東西的。這個計畫是和著名的藝術家兼運動者 Mallika Sarabhai 和 SEWA (非正式女工的 NGO) 一起構想的。我們的想出的圖案包括注入胚胎、胚胎轉移、卵子移除等等，還有其他會帶來壓力

的東西，包括飛機、手機、辣椒等等。

印度製造的最後一幕是這些編織被呈現給觀眾，也就是在 Amrita 闡釋了代理孕母作為一種勞動的概念，以及代理孕母作為具有勞動權益的勞工的看法之後，呈現給觀眾。觀眾於是有機會親自碰觸到這些編織，然後取體會，每一個編織都代表了一位印度代理孕母的勞動過程。然後觀眾可以決定要問什麼問題。

> 印度製造 - 巡迴經驗 (2013-2014)

印度製造在北歐的演出相當成功。2012年秋天在 Stockholm 拉開了序幕。在瑞典巡迴之後，2013年開始在丹麥。印度製造只有巡演版本了。Amrita Pande 和 Ditte Maria Bjerg 想要在會議和節慶時表演，作為一種經驗，展示藝術和學術如何結合、相互激盪。表演有兩個小時，包括了 Amrita Pande 的問答時間，她在劇中扮演了許多不同的角色。■

來信給：Amrita Pande
<amritapande@gmail.com>. 更多資訊
到 www.globalstories.net

> 21世紀之交的 法國社會學

by Bruno Cousin, University of Lille 1, 法國, ISA區域和都市發展委員會委員 (RC21) and Didier Demazière, CNRS and Sciences Po, Paris, 法國

法國的社會學不論作為一個領域或是一門專業，還沒有人從社會學的角度好好研究過。雖然哲學和經濟學已經被許多社會學家分析過了 (Frédéric Lebaron 和 Marion Fourcade)，社會學的部份還沒有人做過。

可是，我們卻已經有須多單篇文章或傳記討論法國社會學。例如 Georges Friedmann 和 Georges Gurvitch 雖然在法國以外沒人認識，可是卻是戰後法國社會學的重要人物，是銜接 Émile Durkheim，Marcel Mauss，Maurice Halbwachs 和新生代的社會學家。此外，有許多自傳文章或歷史，包括了 Raymond Aron，Georges Balandier，Luc Boltanski，Pierre Bourdieu，Michel Crozier，François Dubet，Henri Lefebvre，Henri Mendras，Edgar Morin，Pierre Naville，Gérard Noiriel，Dominique

Schnapper 等。此外還有一些非正式的文章，或是系所及研究中心的檔案資料，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描繪法國的社會學圖像。

第一個主要的進步性轉變是不同學派之間對立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主題組織的建立。雖然學派奠基在理論典範以及領導學者和研究中心，特別是在 Paris，主題組織是共同研究議題的合作網絡。例如今天的法國社會學就沒有像是 70-90 年代被 Bourdieu-Touraine-Crozier-Boudon 的四人學派所主導一樣 (歷史唯物論的衰落和結構主義的興起)。這些學派科學的爭議和敵對至今雖然還沒有完全消失，可是新的理論也出現了，且廣被國內和國際所接受 (1)。不過今天的社會學與其說是理論辯論，不如說是圍繞在幾個大的領域上的知識版塊重組：都市社會學，經濟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教育社會學、遷徙社會學等等。

這個專業化的改變是部份受到研究人員和教師數量增加的影響，特別是在 20 世紀的最後 10 年內。這個改導致了研究者要和其他人進一步去區別，於是強化主題領域的邊界，每個領域都要有一定數量的成員去維持一定的自主性。此外，使用科學文獻的便利性也開拓了領域，不過領域的邊界也日益強化和分明，特別表現在為了要熟悉某個領域的知識而近一部和國際社群對話所日漸增加的機會成本上。像是要同時用法語和英語發表。

從過去 15 年來，許多有名的研究大學，包括 Sciences Po 和 EHESS 等，都尋求國際的注意和影響力，因此間接地讓領域分化越來越嚴重。同樣地，法國社會學會 (2002 年成立) 的組織也強化了領域

>>

“There is no equivalent to the once dominant quadrumvirate Bourdieu-Touraine-Crozier-Boudon”

分化性(2)。再者，主題專門化和法國學界鼓勵的跨學科交流是相當符合的。École des Annales 的最後一個計畫就是去整合這些學科。最後，這個轉變被許多尋求專家的制度所鼓勵。

有三種角色是法國社會學所喜愛扮演的：研究型，政策顧問型，批判型。但是從 21 世紀開始，這起了變化。第一種角色被要求應該要走向國際比較。可是並沒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給研究型學者(Musselin 本期文章)，此外，競爭的研究補助，官僚的管理模式，審查制度(Lebaron 本期文章)等，也削弱了社會學家個體或集體的自主性。

同時，社會學家作為政策顧問的角色並沒有增加。雖然許多人在國家或地方的顧問團隊、智庫等工作，或是一些知識性工作，社會學家對政策的影響力其實很小。其專業性通常只是補充性的，主導的還是專業的政策技術員，主要從訓練公務

員的學校 École Nationale d' Administration 而來，對社會學其實不太重視。此外，經濟學還是比較被重視的學科。不過在公領域若談到社會問題，或是私領域的人力資源，社會學還是會被重視(Neyrat 本期文章)。

最後，社會學的批判面向，像是批判不平等、剝削、宰制、歧視、社會再生產，培力社會運動等，在這些年也變化不少。Pierre Bourdieu 在 2002 年過世之後，沒有一個公認的批判知識分子出現。整個知識專門化的潮流其實就是在鼓勵專門知識分子(Michel Foucault 所言)，而其言論和分析都在報紙上、或是批判性期刊、小型文集中。此外，法國和其他地方一樣，也越來越多反身性思考生產批判性知識為何日漸困難的原因，像是對於社會學的管制，或是國家學會拒絕採用行為規章(Pudal 本期文章)。■

來信寄給 Bruno Cousin <bruno.cousin@univ-lille1.fr> 和 Didier Demazière <d.demaziere@csso.cnrs.fr>

註 1：例如，Luc Boltanski 和 Laurent Thévenot 的行動典範與批判能力的理論，以及 Bruno Latour 和 Michel Callon 的行動者網絡，都廣為被接受，稱為法國實證主義社會學。

註 2：關於法國社會學會，請見 Cousin, B. and Demazière D. (2014) “L’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A Young and Rallying Organization,” European Sociologist 36, pp. 10-11: http://europeansociology.org/docs/Newsletter/ESA_Newsletter_Summer%202014.pdf

> 消失的 學術生涯

by Christine Musselin, Sciences Po, CSO-CNRS, Paris, 法國

法國高等教育和研究體系由三種不同的制度所形塑：提供博士學位的大學、國家研究單位，包括多學科的 CNRS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和專門給生物學的 INSERM 或是給農業的 INRA、以及訓練工業、管理、經濟精英的學校 grandes écoles。法國的社會科學家多數在大學裡面任職，有些在 CNRS 裡面，但是很少。而且這樣的差距還在增加，學生越來越多，教職也增加。有些社會學也在專門的研究機構裡面，但是很邊緣，也通常不是社會科學研究 (1)。最後，還有人在工程或是商管學院裡面，我們對於這方面的資料不多，但是他們其實也都在大學裡面。

大學教職需要博士學位，而申請者必須被國家級的委員會所認可：CNU (Comité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這是為了讓他們第一個職位是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MCF)。這個職位是終身職的。歷史上，法國大學並沒有所謂的「升等到終身職」。不過最近在 grandes écoles 有出現了。385 位社會學博士在 2013 年要求認可，可是 221 人通過而已。而通過的人和幾年前通過的人一起要競爭 27 個社會學教職缺。

CNRS 所提供的缺很少，平均每年 5-6 個。整體而言，學術界能消化的博士可說少之又少。2012 年，只有 6.5% 的通過認證博士有找到教職。MCF 的新進人員平均年齡則是 35 歲，57% 是女性。顯然，許多通過認證者還是被拒絕在門外。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法國學術界還是偏好年輕的學者，像是那些有著直線的學歷和剛畢業的博士。結果就是那些沒辦法馬上進入學界的人就越來越不可能進去了。

一旦當了 MCF，每年的 192 小時教學時數緊跟著而來，許多地方還會被要求超終點。為了做研究，那些花時間的田野研究越來越難。在大城市像是 Paris 的生活開銷大，而每月給 2500 歐元的薪水根本不夠，所以很多人就超時工作，這讓做研究更不可能。許多人一輩子就當 MCF，無法當教授。

升等到教授需要通過 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這是一種論文。升等也是要同過國家委員會的認可。這個通過率算高，2013 年 64 個申請者有 67% 通過。而進幾年競爭並不激烈。2013 年 42 的通過者競爭 21 個職位。2012 年，30% 的新通過者成為教授，平均 47 歲，41%

>>

“Many ‘qualified’ PhDs are left standing at the doors of academe”

是女性 (2)。

這樣的低競爭顯示出其實這條路還是有吸引力的，雖然說薪水不高。薪水從每月 2100 歐元到 6000 歐元不等。這個差距部份取決於年資，以及多快升到正教授。不括社會科學裡面，升等通常較慢。

法國學術的環境在這幾年因為學術治理的改變而變化很大。學術界仍然是公務員身份，但大學也被要求越來越多。從 2007 年，大學必須負責職員名單，讓教師越來越像某個機構的雇員。同時評估的擴張，研究案為主的資金分配和經歷為主的評量方式，讓新進人員和老手之間的差距變大。這也增加了學科間的差距，讓有些學科更可以達到這些評鑑目標。現在要說社會學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或許言之過早，不過未來幾年內這些議題絕對會浮上檯面。■

來信寄給 Christine Musselin <christine.musselin@sciencespo.fr>

註 1：此外，和 CNRS (以及 INSERM) 不同的是，專門的實驗室不在大學之中，而 85% 的 CNRS 社會科學研究者在研究單位都相當活躍。

註 2：數據都是由高等教育研究部所提供：<http://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pid24586/concours-emploi-et-carrieres.html> (May 9, 2014).

> 評價法國社會學

by Frédéric Lebaron,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in-en-Yvelines, 法國

法國社會學家就像其他國家的社會學家一樣，花了很多精力在審查別人的作品和回應評鑑。而法國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組織，以及知識的慣習，讓法國的評價活動有著不同的面貌。

> 博士的評量和指導研究的認可

法國的博士論文有著很特別的評量方法。論文本身通常很長，超過 300 頁，有些甚至到 1000 頁。這會被送到一個評鑑委員會去，通常有 5-6 個教授或是稱之為 enseignants-chercheurs 的人所組成，這包括了你的指導教授。其中的 2 個人必須是校外的 (rapporteurs)，他們有權力停止論文答辯。若這兩個教授認為論文可以通過，則委員會的每一個人，從指導教授開始，會在答辯的時候開始評論論文。他們會問問題，然後通常要 3 個小時。然後，委員決定要不要給予該博士生最高的榮譽 félicitations

du jury，或是 très honorable，或是更低的等級。第一個等級需要委員一致的通過，是秘密投票。最後，委員會主席要寫個很長的論文報告 (rapport de thèse)，作為總結全體的意見。這是很關鍵的報告。

所有的博士生都努力想得到 félicitations du jury，這當然重要，不過也很主觀。有些學校取消了這些制度。社會學則越來越重視論文報告，因為那是對於論文品質的總體評價，還包括了各個委員的評語，以及該博士生得貢獻。

> 學術生產的評鑑 (文章、書籍、報告)

過去已年來，期刊文章的審查有了重大的改變。所謂的常態化評量出現了，就是要與國際標準接軌，包括匿名審查，至少兩位審查人。合理的交件時間。這些改變是由於各個階段所面臨的壓力所導致。

英文出版還是很少見，不過這成為了核心評價標準，這也影響了期刊。有些法文期刊選擇了部份文章翻譯成英文，是為了要去增加能見度，讓那些文章代表法國社會學。

法國研究和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AERES) 指出了一個期刊表，這些期刊有多種語言，代表每個領域的頂尖期刊。當然，人們對於什麼是好期刊仍有主觀的評價，所以這個列表還是有爭議，像是到底屬不屬於社會學，到底好不好等等。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出版書籍還是很重要。論文會出版成書，然後書籍通常是學術辯論和教學的焦點。

> 生涯與制度

學術位置是奠基在特別為委員會的評鑑上。遴選委員會是屬於各個大學的，而國家委員會是決定是否授予教師資格的單位。博士論文和論文報告

“The indicators we use are largely insufficient”

在整個過程中是很中要的文件。然而，論文發表更為重要。此外，教學和學術服務也是。

在此要區別兩個制度，一個是現在 CNRS 或是類似組織所採用的評鑑方式，這取決於當事人是 maître de conference 或是教授。另外一個是升等評鑑。在兩者我們都可以看到國家委員會組成了代表，實施評鑑。然後遴選方式、期刊發表等的辯論也因此產生。

在大學的評鑑裡面，大學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of Universities) 已經歷經了許多專業衝突。雖然這似乎是可接受的評鑑方式，但不是所有的社會學家都認為有必要去建立一個經驗研究的最低符合標準或是出版的品質。此外，許多社會學家拒絕標準化、以參考書目為主的評量方式，評鑑標準因此是個複雜的議題，需要多元意見的納入和討論。因

此有必要繼續辯論，包括教學、研究、出版、學術服務、以及其他的責任。當然，各種方式都要考慮，不能有統一的辦法。

最後，研究中心或是實驗室事由 AERES 的評量，並且主要以出版紀錄為主。其他的標準包括了：內部運作、管理、知識活躍性等等。不像其他國家，法國沒有國家及的排名系統，政府的排名是以學生的專業就業違者。所以，最相關的是碩士學程。

> 更多元和整合的評鑑

法國社會學得未來發展若是要豐富且有創意，那就必須要有多元的研究和出版品質，並且要傳散的世界各地。這必須要拒絕英語出版的霸權，因為那會影響在地的特殊性。此外，我們也要拒絕用引用書籍當成簡化的評鑑標

準。許多精緻的評鑑必須發展出來，然後掌握社會學知識的獨特性。最後，要拒絕各種形式的學閥、學派、還有學術傳統。

更重要的，要保護學者用自己的母語出版。不同語言之間交流要增加沒錯，但是要讓知識的傳散更加平等。

另外，對於評鑑方式的討論也很重要。品質才是關鍵，量化評鑑指標並不够。雖然這些必須考慮，他們也被需被更好的評鑑和詮釋。還有，學術服務的貢獻，民主治理的品質，學術生涯與工作環境等也很重要，這對於新進社會學家來說特別如此。■

來信寄給：Frédéric Lebaron <frederic.lebaron@uvsq.fr>

> 變遷中的 法國社會學專業

by Frédéric Neyrat, Université de Limoges, 法國

從1960 開始，法國社會學開始變成專業前景的實驗對象。高等教育擴張讓社會學學生人數增加前有未有的快，可是這個相對新的學科其實在一開始是透過錄用中學教師所組成的。的確，50 年前，社會學並沒有出現在中學課程裡面，可是即使在經濟學出現之後，以及錄用教師的考試變得很競爭後，社會學在大學裡面還是很少見。

此外，當時大家也質疑社會學的出路。社會學其實是被政治所影響的，像是 1968 的 5 月運動者很多就是社會學家。那些跟隨 Raymond Aron 的人 (*The Elusive Revolution: Anatomy of a Student Revolt*, Praeger, 1969) 會同意 5 月革命是集體亢奮，把運動歸因給社會學的出路是黯淡的。這樣的論述有了新的版本。社會學成為是人文社會學生失業的象徵，所以法國資格研究中心 (CEREQ) 建議這可以被看成是從碩士畢業或是拿到證照的畢業生所共同會經歷的事情。

然而，社會學博士的就業是最有趣的事情。或是說，專業的社會學可以讓提供我們了解這個科系怎麼運作。最明顯的例子是 *enseignant-chercheurs* 或是教師研究者，此外在公立機構的研究員也是。無疑地，社會學作為學科是受惠於

高等教育的擴張的。在 1984 和 2010 年之間，教師研究者的工作增加快速，遠比其他科系快。社會學整體是 302%，所有學科的平均則是 213%。可是，最近的增加速度減緩了，其他科系也是。整體來說，法國社會學是在下滑。大學職位減少。5 年內，職位會減少 25%，會從 2000 減少到 1500 個。同樣的，CNRS 會從 400 減少到 300 個。

同時，工作的不確定性也增加了，這在研究和教學單會都是如此。有更多比例的公共研究是由計畫去分配資金的，也就是透過法國的國科會 (ANR)。博士後的職位也有，但是不確定。此外，大學也開始減少聘用終身教師。當 LRU 法在 2007 年通過時，大學可以聘用臨時教師，確保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可以持續。的確，法國的公立大學有自主性，這是當國家暫時不給予資金時，這就是 Thomas Piketty 最近的文章所要說的 (“*Faillite silencieuse à l’ université,*” *Libération*, November 18, 2013)。結果就是幾乎有 4 分之 1 的大學，包括了世界級的中心，都破產了，而且僱用越來越多的臨時教師。

很幸運的是，社會學的未來不會被限制在學院裡面。許多研究公司和顧問

>>

“Almost one fourth of universities are on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公司都會使用社會學的人才，過去數年間也有了許多的工作機會被創造出來。像是在都市和規劃的前導研究通常是跨領域的團隊在執行。按照不同計畫的重要性，社會學家會擔任不同的角色。這在都市更新計畫中特別是如此，還有在那些特別都市區域也是。計畫管理者需要影響評估報告，所以就需要社會學家的專業。

另外一個研究公司和顧問的市場就是公共政策評估。例如，健康保險就是社會學家常常可以派上用場的地方。同樣地，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社會政策等也是常見需要被評估的領域。最後，企業也通常會需要以下的研究：社會心理風險（壓力、騷擾、自殺等），工作組織（重組、縮編、評量、再置等），性別平等、歧視等。

社會學家並不只是那些研究或是顧問就業市場上的人。研究通常都是跨學科的。此外，社會學和其他的專業者是有競爭關係的，因為其他人也可能會稱自己是社會學家。在法國，社會學家不一定唸過社會學。可是，專業化的上升帶為社會學家的頭銜帶來了一些保證。

例如，一個系所的成立會要求某些專業領域的人來研究或教書。同時會質化和量化的人是比較受到重視的，大家也會想錄用，可是另外一方面具有專業的人才也很搶手（都市、健康、政策等等）。

有些社會學博士在研究公司工作，也已經放棄學術生涯了，因為就業市場並不好。然而，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關係。有些教授和研究員支持這些公司，並且參與其中。相似地，在研究公司工作的社會學家或許也會到大學教書。

最後，社會學家並不單單只有那些有在教社會學或是做社會學研究的人而已。那些讀過社會學並把社會學觀點帶到其他領域的人也算是社會學家。只是很可惜的是，我們並沒有那些資料。■

來信寄給：Frédéric Neyrat <frederic.neyrat@unilim.fr>

> 為什麼法國社會學 沒有人類受試者 規範？

by Romain Pudal, CNRS (CURAPP-ESS), Amiens, 法國

不像其他國家的社會學學會，法國社會學會 (AFS) 在 2011 年決定不採用受試者規範。這個決定經過了數年的辯論，AFS 成立的許多工作小組，參考審閱其他國家既有的規範條文，特別是北美，後制定出一個草稿。

法國社會學是否要採用倫理規範或是受試者保護協定的這個問題，是首先被那些在私人企業、公部門工作的社會學家所提出的，那些都不是學術組織。倫理規範的草稿是建立在其他社會學組織、顧問、健康專業或實驗科學家的規範基礎之上的。

辯論進行得如火如荼，包括在 2009 年，Michael Burawoy 在第三屆於巴黎舉行的 AFS 大會上做了一場演講，說明他的研究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他說，這個研究種族歧視的研究若被要求一切都公開透明，那就進行不下去了。Burawoy 的論點強化了反對規範社會學研究的人的看法。

兩年後，最終計畫版本提出了，並在第四屆 AFS 大會上報告 (<http://www.afs-socio.fr/sites/default/files/congres09/FormCharte.html>)。這個計畫有兩個部份，第一個是許多人支持的所謂「最佳研究執行」，包括研究生和指導教授的權利

和義務，抄襲的禁止、教學或研究工作上的剝削、騷擾等。然而，許多人對於解決爭端的機制的有效性提出很大的質疑，像是：有必要成立一個社會學的委員會去處理嗎？正當性在那？會是怎麼樣？其手段為何？誰來執行？AFS 有權力仲裁嗎？這些問題顯示了社會學家的質疑，即使規範訂定了，誰來執行仍大有問題。

這個計畫的第二部份：社會科學的最好研究方法，是被批評得最嚴重的。特別是在下面這段文字：

社會學家有責任清楚向那些參與研究的人解釋研究的內容。為了要完全理解為什麼加入研究，當事人必須被告知：研究主題、目標、研究負責人、執行者、贊助者、結果的公開方式。社會學家不能在當事人不同意的情況下利用工具，像是錄音機、錄影機等。當他們被研究者紀錄時，他們要被告知原因。

那些支持這些規範的人說這是從醫學、生物、心理學而來的好規範。此外，他們也要求社會科學要有更透明的研究過程去保護人類，特別是資訊的運用和資料收集。很顯然這引發了很大的爭論，這些政論被收錄到 Sylvain Laurens 和 Frédéric Neyrat 編輯的 *Enquêteur : de quel droit ? Menaces sur l'enquête en sciences sociales* (Éditions du Croquant,

>>

“Freedom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was reaffirmed”

2010)。

那些反對採用規範的人聚焦在「covert research」，也就是那些參與者並不全然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者或社會學家研究。很多有名的社會科學家就是這種研究，像是 Michael Burawoy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另外像是 Donald Roy 對於工廠的研究，Paul Willis 的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或是 Laud Humphreys 的「tearooming」。許多人認為這種研究應該持續，不該受限，可是若是 IRB 的委員沒有社會學家，那就慘了。社會學家的自由應該受到保障，也透過同儕審查來鑑定研究品質，包括方法、理論、倫理等。這些對社會學都是很基本的。

總之，這些問題被提出了，答案也變得越來越明顯。有了這些規範，我們還有可能可以去執行制度歧視的相關研

究嗎？可以研究貪污嗎？可以研究經濟學或是新聞學嗎？可以研究政治檯面下的權力運作嗎？答案是否定的。

儘管有爭辯，上述的討論被保留在規範之中，也讓法國社會學家產生了很大的敵意。所有人都同意倫理的問題應該被提出討論，可是 AFS 若有權力因倫理考量而阻止了研究，這是被社會學家認為是政治干涉，會讓社會學面臨困境。

因此，規範被拒絕了。社會學研究的自由被再次肯定。法國社會學家提醒了彼此，就是我們的工作一部分是去揭露各種不平等和宰制的形式，以及研究在出版之前要通過這個社群的同儕審查來確保學術品質。■

來信寄給：Romain Pudal <romain.pudal@free.fr>

> 社會學在那？ 環境變遷和社會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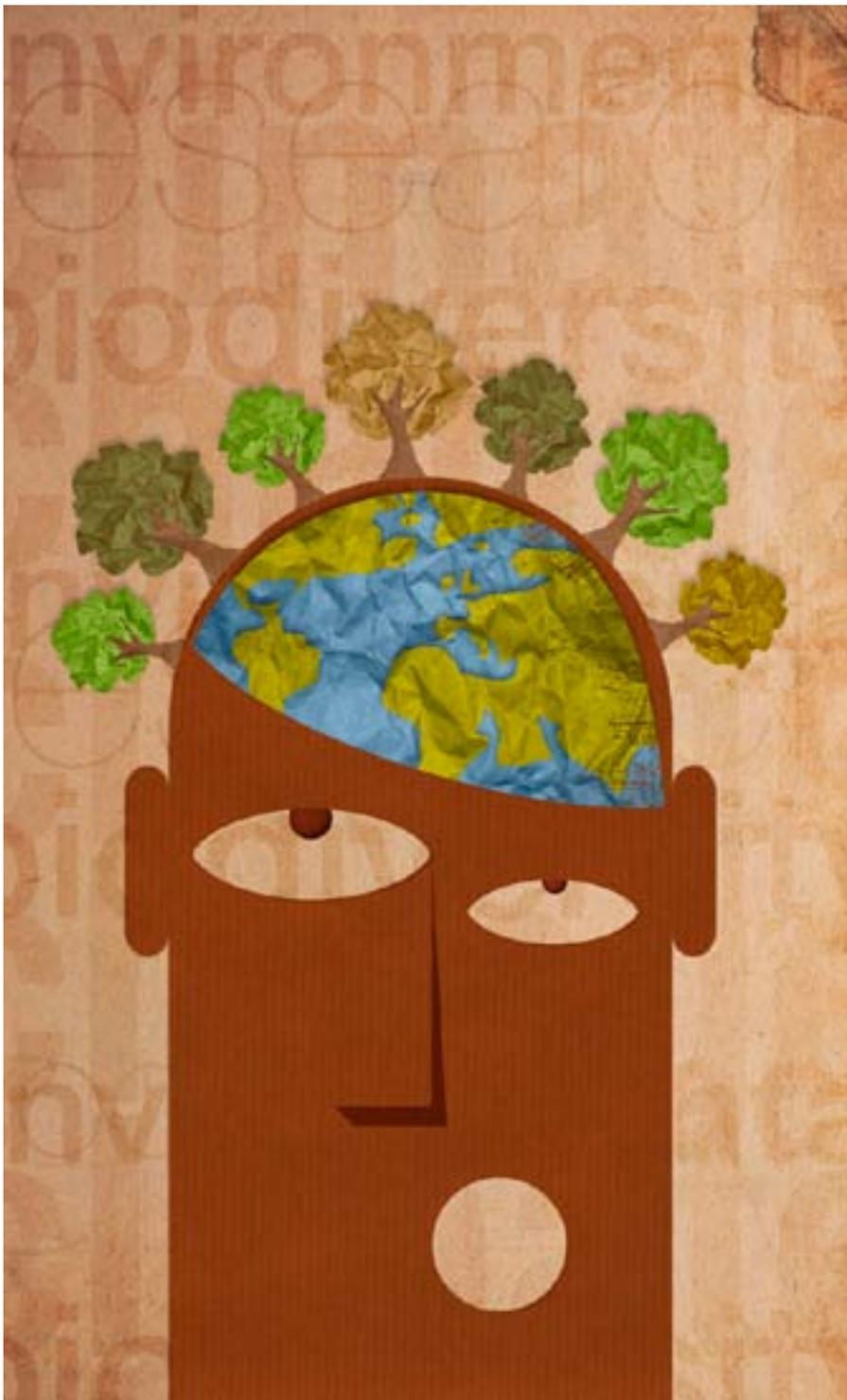
by Stewart Lockie, James Cook University, 澳洲，ISA環境與社會委員會會長(RC24)

社會學被低估的參與環境變遷的能力。Arbu 繪。

社會學家時常抱怨社會學沒有對環境研究和治理貢獻些什麼，政策制定過程中總是被自然科學家所主導，以及被人徵詢的時候，總是那些枝微末節的問題，像是社會影響、執行障礙等等。甚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社會科學家，像是生物學家或是工程師，去把他們的系統機械觀點普及化。

我們怎麼解釋這個對於社會學的忽略呢？學科的傲慢或許可以解釋一部份，可是社會學所關心的權力、不平等、民主等概念或許更適合。到底社會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扮演多少角色？社會學的知識呢？以及那些觀眾呢？

按照國際社會學委員會 (ISSC) 的說法，答案是一點點。每三年，ISSC 會出版最新的報告，討論社會科學面臨的諸多挑戰。2013 年的世界社會科學報



告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總結了各種社會科學學科和全球環境變遷的關係，並製作了一個議程，好讓社會科學可以對於環境變化的議題做出貢獻 (1)。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包括了以學科為主的各個組織，包括了 ISA、國際人類環境變遷組織等等。表面上，這是個多元的議程。可是，當觸及到很深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時，這個議程並無法讓社會科學感到興趣。

這份報告使用了文獻分析的方式指出了社會學在整個環境研究中是缺席的。他們在 Thomp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搜尋那些包括「氣候變遷」、「氣候政策」、「環境變遷」、「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等關鍵字的文章，然後做出結論認為，雖然總體文章有增加，可是還是相對少數。

我相信文獻新可以系統性的了解社會學家作為研究者、老師、公民等做了什麼事情。若我們很快看一下 ISA 的研究委員會就可以知道社會學其實做了很多關於環境的事情，也很多人在跨學科的環境期刊扮演重要角色，像是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Local Environment。此外，許多跨學科的實驗、研究等，特別是在全球南方，他們其實都沒有被納入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這或許是 ISA 的環境社會研

究委員會在新出版的期刊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所可以處理的議題。

可是，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也提供了我們思考如何擴大社會科學影響力的契機。這些改變的契機，意味著我們要回答許多永續和平等環境轉型的問題，像是：

- 1. 歷史和脈絡的複雜性：**當代全球環境變化過程怎麼被政治經濟所影響？他們怎麼和其他的社會過程，像是戰爭和遷徙有關係？環境變遷的經驗怎麼因時空、階級、性別、族群、信仰而有所不同？
- 2. 結果：**全球環境變遷怎麼影響人類？這些後果如何擴散？人們怎麼回應？條件和變遷的可能：什麼促進的個人和集體的變遷？什麼是社會變遷、政策介入、民主程序之間的關係？社會科學怎麼凝聚共識做出貢獻？
- 3. 主觀的意義詮釋：**人們怎麼理解環境變遷？社會學習的前景？什麼是隱藏在人們選擇和行動背後的預設？相反的，什麼讓人們產生冷敢、懷疑、甚至反抗？
- 4. 責任：**Responsibilities: 誰應該承擔環境變遷的成本？怎麼幫助弱勢？
- 5. 治理和決策：**決策如何面對不確定性？不同的環境變遷的框架怎麼達成政治共識？什麼樣的制度安排可以讓政策制定者科學家對話得更好。

這裡的目標是去不是

發展出一個中間的議程，讓政策相關的社會科學可以貢獻，而是要讓社會科學更好、更大、更強、更不同。社會科學可以做的包括了充新確定環境變遷作為社會過程，影響政策和參與問題解決，知識上回應全球環境變遷，以及社會科學在實踐時的反身性 (2)。

這不是什麼沒有理論反思和創造的視野，而是一個回應社會巨大變遷的框架概念。許多社會學家或社會科學家已經正在做這件事情了，就像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和其他例子所顯示的一樣。Karen O' Brien 就倡議對於環境變遷有更深的體會，整合地球系統科學，納入人類非線性和反身性的複雜能動理解 (3)。John Urry 研究反身消費行為的可能性，刺激更多的創意和轉變物質和能量使用的強度 (4)。光譜的另一端，Alberto Martinelli 提出的全球治理的模型，其中民主國家、超國家組織、責任企業、NGO 等一起合作形成一個研究的社群，並確保民主的決策 (5)。許多其他學者也關心合作式學習對於環境和社會正義的影響 (6)。

這些例子和我說稱的「自我相關社會學」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說，理論之間是要有對話關係的。用很深奧的語言和複雜的術語總是隱藏了很多預設。若要超越自我相關社會學，我們需要把手弄髒，也就是說要去和別人

>>

合作，一起創造知識，位社會變遷做出貢獻。這不是什麼倫理問題，而是有效性問題。若社會學研究目的之一是去了解社會和環境的轉變，多重學科整合或合作在認識上是必要的。

如何有意義的參與社會和環境的變遷並非總是有很清楚的答案。有些方式會有專業和個人的風險。有些並不可行，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列出了一些已經採用的方式，包括了 Future Earth 是一個 10 年的 ISSC、ICSU (國際科學委員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Belmont Group 等其他組織的聯合方案。我很強管例每個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有興趣的人可以訂閱 Future Earth 的刊物，考慮如何參與某些活動。像是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所說的，了解合作的可能，像是 Future Earth 這樣，是需要社會科學家

去質問權力、不平等、民主等的問題的。我或許不同意社會學家缺席的說法，但是我同意社會學家可以做得更好。■

來信寄給：Stewart Lockie <stewart.lockie@jcu.edu.au>

註 1：ISSC and UNESCO (2013)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3: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 OECD Publishing and UNESCO Publishing, Paris. 可見 http://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world-social-science-report-2013_9789264203419-en.

註 2：這些首先被提出：Hackmann, H. and St. Clair, A. (2012) Transformative Cornerston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 Global Chang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Paris. 可見 http://www.igfagcr.org/images/pdf/issc_transformative_cornerstones_report.pdf

註 3：見 Moser, Hackmann and Cailods, Chapter 2,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changes everything: Key messages and recommendations.”

註 4：例子可見 Lockie, S., Sonnenfeld, D. and Fisher, D. (eds) (2014)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Routledge, London.

註 5：Chapter 4, “What’s the problem? Putt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to perspective.”

註 6：Chapter 53, “Are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evitable?”

註 7：Chapter 83,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註 8：例如，J. David Tabara (Chapter 11, “A new vision of open knowledge systems for sustainability: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scientists”), Witchuda Srangiam (Chapter 76, “Social learning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Thailand), and Godwin Odok (Chapter 79, “The need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Nigeria”).

註 9：<http://www.futureearth.info/> and <http://www.icsu.org/future-earth/>

銅、水、土地：

秘魯Piedra Alta的礦業

by Sandra Portocarrer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Lima, 秘魯



秘魯原住民抗議：不要採礦、受夠小偷和污染了！

秘魯最近的經濟有了很大的成長，像是GDP，低通膨，低債，穩定利率。按照IMF的資料，秘魯是崛起的新星，是個強韌的新興市場。

不過，何時以及為何這個國家從一個農業國變成政治經濟的新興市場呢？秘魯有世界第二大的銅礦量，所以礦業對秘魯來說很重要。這可以吸引許多國外投資。秘魯的GDP成長率是預期在2014年底可到5.3%。這個成長是可說是很穩定，且在14-17年會有平均5%的成長。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對於低成長的威脅居然是社會上對於採礦的反應，若是礦業被耽擱了，企業信心會下降，在下個10年會威脅減少到534億美元。

過去6個月，我已經成為秘魯第二大銅礦公司的社會學家。Tacna這間公司是由墨西哥人所經營，在60年代建立的。我住在一個礦區，大學距離市中心要2個小時的車程。我的公寓很舒適，有冷氣、熱水、網路、電視等等，還可以有溫水游泳池，

有高爾夫球場，網球場、健身房、娛樂設施，可是那些礦工不能有這些設備，只有管理階層可以使用。

我一週工作六天，每天十二的小時。這是一個被秘魯認為是擺脫貧窮的工業。我的工作讓我可以到直接和間接的地方去，所謂直接影響的地方式那些採礦區，環境直接被活動和計畫所影響。而間接影響地區在採礦區之外。

我的工作讓我可以對於採礦有第一手的認識。這個產業並沒有平均對於所有人有影響。一個問題是貧窮社區怎麼回應這個巨大的經濟產業變遷呢？而這個Piedra Alta地區提供了另外一個證據，就是遷徙重置居民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隱藏面向。秘魯南面缺水的地區已經讓上千戶農業家庭遷到有水耕作的地區，但是通常是違法的。Piedra Alta就是這樣的地方。

2001年，抗議者在和警察衝突幾次後，600多名農業家庭佔領了國有土地約10000

畝，希望可以有水。這些 Piedra Alta 家庭從 Tacna 高地來，也從 Arequipa, Cusco, Moquegua, Puno 等地而來。

一開始，許多家庭是為了農業需要而佔領這些地區的，因為他們一個月要耕作 3 次。到 Piedra Alta 可能需要 5 天，而因為警察要驅離他們，那些農戶就決定要長期待下來。在訪談中，許多居民描述這塊土地是因為他們的創業頭腦而來了，他們不僅僅使用水，還投資基礎建設。而佔領那土地之後，這些農戶建造了 6 哩的渠道，可以每秒讓 1000 公升的水流過。但是健康部門擔心這些水的品質。

諷刺的是，水壩其實是礦業的必需品，而如今卻成了這些農民的生存方式。在試過許多農作物後，失敗了很多次，Piedra Alta 的居民已經是種植牛至的專家，佔了 70% 的土地。

這個農業的成功也伴隨著合法化。複雜的法律讓合法化過程歷經了 10 年的時間。2013 年 10 月，Cerro Colorado 是 Piedra Alta 的一個省，宣佈成 Piedra Alta 的一個政府區域。這意味著社區可以合法的生活在那。

而最大的挑戰仍然存在。礦業公司將

會擴張，加倍產量，用更多的水。政府的環境評估說礦業不會用到更多的水，水還會被回收。這對環境抗議者來說是個好消息，可是對於 Piedra Alta 的居民而言卻不是。回收的水會不會有問題？而秘魯政府現在把相關的問題都推給礦業公司。其實許多的社會抗爭都和水有關。再者，污染在這個地區是很嚴重的，讓農民失去耕作信心。對他們來說，什麼保證也沒有。■

來信寄給：Sandra Portocarrero <svnp86@gmail.com>

國際化和審查文化： 捷克社會學的例子

by Martin Hájek, Charles University, 捷克



Jiří Musil (1928-2012) 在捷克第一任總統 T.G. Masaryk 的像前說話。

審查文化和對於競爭的重視影響了大學和科學制度，在很多國家都是如此，捷克是最好的例子。其對於學術、科學、發表的影響，有許多文章探討過 (1)。可是，審查文化對於社會學相對小的社群的影響，卻是一個被忽略的議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相對邊緣，而是影響往往不是立即，也且往往很複雜。審查可以有好的和壞的影響，好的來說，審查可以鼓勵科學家參與國際社群，不會被限制在國內。壞的方面，這些過程可能會低估了地方學術社群的重要性。兩者之間有張力，並各有支持和反對者。捷克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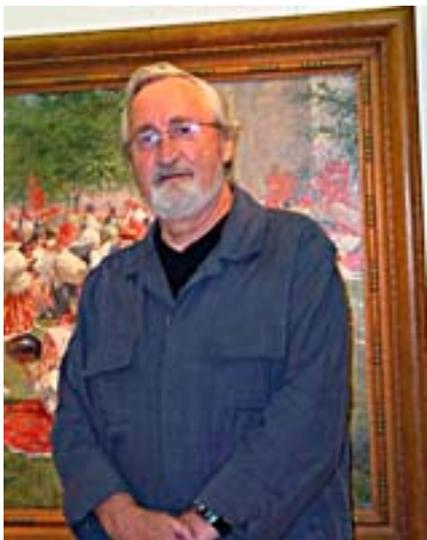
在捷克這樣小的國家裡面，其實只有 1000 萬人，支持嚴格審查和競爭的人總是宣稱只有國際社群可以決定什麼是好的社會學。為了這個需要，在地的社群往往只有幾百個

人，容以變成幾個小團體，相互競爭資源。他們也宣稱這種情況讓同儕審查更為複雜，因為只不過是再生產了權力結構和學科劃分，無助於知識的增長。

相反地，反對國際化和標準化的人強調在地脈絡的重要性，認為國際發表和審查只是讓國際的議題有利，遏止了在地議題的對話。他們也宣稱，若在地議題需要國際化，然後被翻譯成國際可認可的文章，這過程往往犧牲了在地文化的意義以及扭曲了現象本身。這對於自然科學可能是可行的，或許有些例外，不過對於社會科學來說是行不通的。

這些爭辯，其實兩方有一個對的共通點，那就是提昇研究品質。大的科學社群中，其使用的語言往往只有一種，所以平衡模式是可行的，因為在地和全球的社會學是彼此交織的。但是在小的社群裡面，語言可能是少數人在

>>



Miloslav Petrusek (1936-2012)是著名的捷克社會學家，注重在地議題。

用的，那麼推動國際化可能就有反效果，讓本土語言不再是溝通的工具。為什麼？因為作者要寫兩種語言的文章。以捷克為例，捷克文只被說捷克語的人閱讀，所以其影響力只是在地性的。而在英文文章裡面，作者必須對國際讀者的胃口，相對的捷克人就會興趣缺缺。這產生了兩種寫作模式，一種是在地導向，另一種國導向。雖然問題可以被看成翻譯問題，可是並不是。因為這牽涉的研究議題的選擇和發表策略的選擇。

我假設有些讀者看到以上的說法會搖搖頭，說「這不是什麼新問題啦，以前就是這樣，雙軌制，國際和在地都有」。我同意，可是呢，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似乎只是個人

學術生涯選擇的問題。舉例而言，Miloslav Petrusek (1936-2012) 是一位捷克社會學家，也是一位本土導向的社會學家。雖然他對於國際上的社會學潮流很熟，多語並行，但是他只用捷克文發表文章，有時候用波蘭文和俄文。他的學術對於捷克影響很大，也影響了大眾對於捷克社會學的認識和地位。而另外， Jiří Musil (1928-2012) 是一位國際有名的都市社會學家，對於國際上的影響遠大於本土，是 1998-2001 的歐洲社會學會會長 (2)。

可是這種所謂個人選擇的情況早已改變。審查和競爭的文化只對於國際化有利。所有本土的辯論都被認為是次等的。而本土的社會學家往往拿不到經費，也連帶影響到了生涯。因此，在捷克要寫一本好的教科書是很荒謬的行為，因為對於學術聲望無助，也和國際化相反。結果，捷克學生從國外的社會學家，像是 Giddens 的教科書學習，那教科書強調美國和英國。這些社會變成了典範去理解在地社會的運作。新的社會學術語往往透過翻譯介紹的在地社群，而翻譯者往往不是學者。在地的公眾也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了解

當今的社會。

審查和競爭的文化讓國際導向的學者比較有利，若是科學品質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判對，那麼許多學者只會著重在發表英文著作。的確也有許多年輕有為的學者這麼做，最好的都發表在英文期刊。

我不是在倡議在地社會學比較好。在許多例子中，可能幾乎了，就是在地社會學表現其實一般。可是，這是在地社群知識溝通和教育的唯一方式。而現今的國際化導向，讓在地發表變成只是發表分析結果，而不是科學實做。全球導向社會學家認為國際社會超越地方，會讓大家認為地方社會只是國際社會的例子而已。■

來信寄給：

Martin Hájek <hajek@fsv.cuni.cz>

岌岌可危的社會學：

捷克經驗

by Filip Vostal, Charles University and Academy of Sciences, 捷克



社會學受束縛，不過還可以行走。

岌岌可危是用來描述一個不安全、不穩定、不夠力的情況。這也清楚的掌握了當代社會學的特徵。首先，社會學之所以岌岌可危，代表著科技的重新在定義社會學的知識。再者，新自由主義年代中學院的變化讓社會學變得岌岌可危。還有，岌岌可危也可以用來描述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社會。當國際上關注到了社會學的特徵，但是地方的緊張情勢可能被忽略了。這篇文章就是要從捷克的脈落來討論全球發展。

讓我們從社會學的內部面向開始吧。無疑地，21世紀社會學將有新的資料收集方式和方法，而對於科技，社會學也會有新的回應。傳統的經驗方法(調查和訪問)已經被又新又快的數據所挑

戰。像是巨量資料，社群媒體等等，這些不但挑戰方法本身，還挑戰理論。我們可以把所謂「社會的」看成是一個包括各種目的類別的總和嗎？我們應該同時理論化生物的個體和科技的個體嗎？為了宗教或是世俗？為了整體世界或是個別社會？社會學現在關注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例外狀態，動態和變動的網絡。而傳統的類別像是階級、性別、民族、族群等，社會理論最近關注突現、意外、風險等等。傳統而言，社會學需要時空的距離去進行研究，但是有些當代理論反應、體現、甚至擁抱更廣的新世紀社會生活，像是液態、混亂、速度。

岌岌可危的社會學有時候像是一種介於科技和傳統之間的社會實做的衝突。有些模態(經驗或是理論)是反抗可挑戰的。例如社會學的地方鑲嵌性，這就是一種不斷被個人知識路徑和各國社會學歷史所結構的場域。Michael Sward說，慢理論包括了緊密的思考和審慎的態度去看待文化的特殊性，思考脈絡性和價值、解釋不同的意見與判斷，擁抱脈絡知識的生產。脈絡化、慢的、民族誌等的知識和科技化的、快的知識相差很大。捷克社會學就像其他的社會學一樣，會在這兩者之間擺盪，在地方的個殊性、歷史發展，和全球化、科技發展兩邊來回徘徊。

但是或許最不安的是來自於外部的再生產情境。市場教條主義，商品化、企業管理等等，讓學術困難的行走著。這些也讓許多學術人員困擾，且影響不一致，增加壓力、負擔，不安。人人都發現時間壓縮所造成的壓力和對批判性思考所造成的影響。美國是一個天然的實驗室，看看新自由主義怎麼影響學術結構，但是這個潮流已經加速了許多學術企業化的腳步，捷克就是如此。

可是當我和英國的社會學家談話時，英國和捷克很不一樣。幾個面向上，包括勞動條件、閱讀寫作研究的時間、空間等等。的確，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討厭的詞，像是卓越、創新、競爭力、知識經濟等，捷克的學術環境和美國英國校園小說 *Fight for Your Long Day* 或 *Crump* 所描繪的場景大不相同。儘管新自由主義模式被捷克的政治所採納，儘管學術也一直被限縮、商品化、市場化，捷克學術界仍然抵抗商業意識型態的侵略。奧國哲學家 Konrad P. Liessmann 對於學術商品化的批判廣被捷克學術所採納。而歷史學家 Howard Hotson 對於英國學術改革的批評也被捷克學術界所認同。所以新自由主義的學術潮流在中歐或許碰了壁。

即使有地方性的反抗，新自由主義還是可能影響了社會學家。可是這些壓力是在新世紀社會生活已經變得很複雜和分化的脈絡下所產生的，那要求新的

理論、嚴謹的分析所謂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如何在地方發生，而地方議題如何全球化。現在我們需要一種可以描述、解釋、改變這種現代性的社會學。

第三種的岌岌可危或許幫助了社會學去面對挑戰。不斷的發問、挑戰社會現實，仍然是不論詮釋或解釋的社會學的核心。此外，社會現象、過程、文化、制度、關係仍然不是自然的，是需要被解釋的。捷克社會學家 Miloslav Petrušek (1936-2012) 特別關注文化、藝術、社會學之間連結，認為文學也可以用來理解社會。社會學仍然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包括了人文和文學。可是同時社會學也是一種常態科學，有典範和制度。這種雙重性和不穩定性一直是社會學的獨特的地方。■

來信寄給：Filip Vostal <filip.vostal@gmail.com>

> 全球對話的 阿拉伯團隊

by Mounir Saidani, El Manar University, 突尼西亞

2011年2月底，Sari Hanafi 寫 email 問我是否可以幫忙找全球對話的阿拉伯翻譯。我把這個看作是突尼西亞革命的好成果之一，發生在 Zein Al-Dine Ben Ali 倒台後的幾周。但我其實也在考慮自己的英文是否好到可以獨自勝任這個工作。然而我也找不到翻譯，遂決定自己親自來做，不過我是翻譯法文，而非英文。不過在接下來的一期，也就是3個月後，我開始翻譯英文，我以前就有過經驗，這次還有 Sari 的幫忙。在我 Facebook 上，我把阿拉伯的版本跟阿拉伯的社會學家公佈，而我的英文也越來越好，對社會學的知識也更加渴望，並透過這樣的工作讓我跟全世界接觸。總之我從中學到很多。在2013年的Ankara 國家學會會議有幸可以和其他的翻譯者見面，也讓我對這份工作倍感榮耀。此外，這也促使我用英文發表我的作品，我想這是另外一項意外的收穫。■

來信寄給
Mounir Saidani <mounisai@yahoo.fr>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Mounir Saidani 從2012年開始是突尼西亞 El Manar University 的 High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社會系副教授。從2000年到2012他在 University of Sfax 教書。更早之前是中學的法語老師，教了18年。他的研究興趣和發表圍繞在文化、藝術、知識等的社會變遷。其用阿拉伯文發表了7本書。他也是 High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working on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的多學科研究室的成員。



Sari Hanafi 是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的教授，也是阿拉伯語期刊 Idafat: the Arab Journal of Sociology. 的編輯。在2014年的橫濱 ISA 世界大會他是國家學會的副會長。此外，他也是阿拉伯社會科學會議的成員。他的著作包括了期刊和書籍篇章，主題是巴勒斯坦的離散經驗和難民、遷移社會學、科學研究的政治、公民社會、精英轉型、轉型正義等。書籍包括了 UNRWA and Palestinian Refugees: From Relief and Works to Human Development (共同編輯 L. Takkenberg and L. Hilal, 2014) ; The Power of Inclusive Exclusion: Anatomy of Israeli Rule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共同編輯 A. Ophir and M. Givoni, 2009, 英文與阿拉伯文)。即將出版的書是 Arab Research and Knowledge Society: The Impossible Promise (共同作者 Rigas Arvanitis)。